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大風出版社

No. 2022~17

2022年12月28日

无产阶级的伦理态度

(美)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¹

編者按：基督教反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全面引進階級分析。美國左派有蒂利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² 右派有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拉丁美洲更有武裝鬥爭的“解放神學”。³ 奧巴馬說他從尼布爾學到最重要的觀點

¹ 摘自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13~13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² 保羅·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東方出版社2008；《政治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³ 劉春曉：《救贖下的解放——對“解放神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楊煌：《解放神學：當代拉美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衛建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個調查報告》，紅旗出版社2004。劉清虔：《邁向解放之路——解放神學中的馬克思主義》，臺灣：人光出版社1996。

是“這個世界存在著嚴重的惡，”⁴ 尼布爾追求〈世界大同〉“頑固的自私自利者會破壞掉任何民主的進程；”⁵ “法規不能使生活的力量秩序化。…通常，法律規則是理想產生的道德觀念與現實社會各種勢力達到的平衡，二者的妥協。”⁶ “馬克思主義對於生產性財產社會特徵的認識與理解，顯然比資產階級的觀點更接近真理，…從總體上說，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階級利益產生的腐敗作用，”⁷ 理想產生的道德觀念是一個社會成其為社會的根據。

以往所有的罪孽深重并妄图使社会非正义永存的社会,并没有遇到受这种社会制度迫害的人们的有效的反抗。的确,在古代有奴隶暴动,在中世纪有农民起义,但这些暴动和起义都是分散的,因而通常是徒劳的。它们表现出饥寒交迫的人们反抗的猛烈,这些人没有一种能提供他们尊严和支持他们持续不断奋斗的社会哲学,也没有足以应付他们所面

⁴ 2007 年奧巴馬說“他是最尊敬的哲學家之一。…這個世界存在著嚴重的惡，還有艱難、痛苦。當我們堅信我們能夠消除這些現象時，我們應當保持謙卑和虛心。但是，我們又不應當讓這成為犬儒主義和無所作為的藉口。”（何懷宏：〈序一：追求光明，理解黑暗〉5~6 頁，尼布爾：《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政治家風格的口號應當是‘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我們的時代充滿邪惡。’在我們這個時代，明天的邪惡可能是核毀滅；所以，這一口號特別合適。”（尼布爾：《自我與歷史的戲劇》181 頁，上海三聯書店 2018）

⁵ “因為這一進程要求，對他人需求，要具有最起碼的關懷。”（原文黑體五章標題，尼布爾：《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121、118 頁）

⁶ 筆者黑體加重；尼布爾：《人的本性與命運》下卷 257 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6。

⁷ “機器所代表的財富和機器製造出來的財富，之所以成為可能，都離不開複雜到難分彼此的貢獻。私人擁有這樣的一個過程，是時代的誤植，是不合時宜的；而個體控制如此集中的權力，則極易導致非正義。…美國的財富、安全性和領土的遼闊，使資產階級的錯誤認識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發揮了更大的力量。”（尼布爾：《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81~83、117 頁）

临问题的政治战略。当饥饿和贫困使奴隶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就爆发了起义，但偶然的起义不能从实质上改变他们屈从的态度，这种态度一般是古代和中世纪下层阶级的特性。道德犬儒主义（moral cynicism）、⁸平等的理想主义、造反的英雄主义、反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将其阶级提高为能表明他们忠诚的共同体，所有这些现代工人阶级所特有的道德态度，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民主运动的结果。这种民主运动，在排除工人于主要好处之外的同时，确实给了他们最低限度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使他们具备了一种对政治和经济事实的认识，而其他时代无土地和无财产的阶级却不具备这种认识。但上述工人阶级所特有的道德态度却主要是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结果。

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是涉及个人的组织。地主和农奴、雇主和工匠，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有时是密切的。个人的身份使得社会关系的非正义和不平等暧昧不明，并有所缓和。地主和雇主的个人责任感实际上证实了这种关系的非道德性质，而传统的慷慨解囊的女慈善家悲天悯人的慈善活动，又给道德功绩的衡量标准增加了混乱。技术文明的兴起加强了所有权和权力的中央集权，它摧毁了所有者的个人责任感，使工人个体消失于群众之中，用股份所有制结构和集体生产技术，掩盖了工业生产关系中的人的因素。通过使人的关系带有日益增强的技术性而更清楚地揭示出人类活动的经济动机，它使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抽象出的经济人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它的生产方法和交往手段在有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提供了更高强度的社会凝聚力和更集中化的控制。因此，它通过使一个具有特定经济地位的个人更明确地加入一个自觉的社

⁸ 源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犬儒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安提斯泰尼和狄奥根尼，该学派轻视社会上已经确立的规范和价值，摒弃物质享受与奢侈，主张简朴自然，像犬一样生活。犬儒主义者也常译为“讽世者”、“愤世嫉俗者”。——原书校注

会政治集团并让他们建立起能表达集团共同利益的组织，从而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对抗。⁹

工业文明这一发展的结果生动地显示在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上。这些态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里已得到了权威性的表述和界定。批评家们也许要争辩道，马克思主义并非无产阶级天然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感染的一种疾病。例如，他们也许会宣称，与其说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工人斗争经验创造出来的教条还不如说是这个教条创造出了工人斗争的经验。这些批评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是确实的，或者至少在表面上讲得通。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足够正确地说明了产业工人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从而使它成为所有自觉的有政治才智的产业工人可以接受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变化着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也许会使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受到限制，但不容否认的是，或多或少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西方文明中的产业工人的政治信念。假若美国工人在目前几乎是例外的话，那么事实上人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充分成熟，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必将出现。

假若我们用伦理学的术语来分析一下有自觉政治意识的工人的态度的话，那么他们最鲜明的特点大概就是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他们不自觉流露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主义的结合。产业工人对人的德行几乎没有信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社会设计一个严肃的道德理想。

道德犬儒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决定论中得到了表述。马克思在他《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用简洁的措辞陈述了他的经济决定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

⁹ 罗伯特·布来希特在《崩溃》中旗帜鲜明强调的是古代与近代社会非正义和阶级特权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¹⁰ 这种决定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一些弟子那里并不绝对的一样。恩格斯宣称“经济条件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和结果，政体……法律的形式……政治、法律、哲学理论、宗教观点……所有这些都对历史斗争产生影响，并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历史斗争的形式”。¹¹ 用这样理性的形式来陈述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很少有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对此表示异议。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中可推论出彻底的道德犬儒主义。人们完全可根据权力与权力的冲突来理解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所有文化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力量都是“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虽然理性化了，但未对各阶级的经济行为有重大的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被认为本身就具有权力，并且造成了社会的非正义，没有任何手段可剥夺、限制或摧毁这一权力，而只能用暴力来反对它。托洛茨基宣称：“拯救的首要条件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统治的武器。当所有权力机器依然处于资产阶级掌握之中时，要想和平地获得政权是毫无希望的，更无希望的是企图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取得政权的想法。”¹² 假若说摧毁政权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内部集权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一个希望并感到安慰与鼓舞，因为这个过程将减少有产阶级的

¹⁰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8页，人民出版社）

¹¹ 转引自 E. R. A. Seligman：《经济史观》351页。

¹² 托洛茨基：《专政和革命》42页。

数量而使有产阶级的防线易被突破，而工人阶级痛苦的加重则将产生强大的能量，革命力量正由此产生。因此，当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灭亡既创造了可能性又提供了工具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个灭亡过程是自动的，他并不指望不经革命斗争就能控制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社会哲学和预言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信仰和希望，倒不如说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教义。因而，仅需指出的是，凡是工人严重遭受社会非正义对待之处，凡是他们遭受最彻底剥夺之处，凡是他们微小利益都要受有产阶级政治压力胁迫之处，他就会用真正的未经修正的马克思信条来表达自己的要求。马克思和那些朝更乐观主义方向修正其信条的人的分歧并非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是受惠较少的工人和受惠较多的工人之间的分歧，是那些洞察到现代资本主义确已无望的人和那些有较好经历从而助长了一种资本主义更有希望的观点的人之间的分歧。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紧接而来的工人的不安定是否会使所有的产业工人最终都变为前者，这是只有历史才能回答的问题。同时相当有趣的是，经济决定论者是如此倾向于谴责改良派和议会社会主义的道德卑鄙，因为他们的信念明显地是由他们的经济经历所产生的。他们知道只有在经济贫困的境况下才能发展革命热情，但他们发现他们的道德评判和决定论的信念难以调和一致。个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他的社会哲学不是出自他个人的经历而是出自对工人阶级的经历和必然性的想象性认识，理所当然地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批判那种从受惠较多的工人中而不是从受惠较少的工人经验中产生的理论；因为他想象地与最少受惠的无产阶级认同，他感到那些未达到这种认同的人所缺乏的是勇气或者是想象力。十分有趣的是列宁从来没有坚持其决定论，因而并未断言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经验的天然产物。他相信没有知识分子的援助，工人就不能制定一个适当的社会哲学。他说：“所有国家的历

史，证明了工人阶级只能发展出工会主义的意识，即确信有必要联合成工会去和雇主作斗争，并要求法律要有利于劳工等。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从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建构的哲学和历史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者，都把自己归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里。”¹³ 知识分子高度的历史远见必须与缺乏这种远见的工人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然后才能引申出正确对待这些经验的理论。这种思想是对彻底决定论的有趣的确证，它使列宁避免了许多更彻底的决定论者所陷入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道德犬儒主义不重视政治领域中所有的伦理要求和成就，这特别表现在对民主国家的评价上。真正的无产阶级认为民主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工具，在这点上他们的彻底的犬儒主义与慷慨激昂地过高估计政治民主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这种政治民主却正流行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列宁宣称：“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¹⁴ 要公正分析现代民主制中有产阶级的权力；他们对立法的支配，对有歧义的法律几乎总是作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解释，以致当法律适合他们的目的时，他们就以法律为借口，这样就很

¹³ 《列宁文集》5卷141页。（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1卷27页译文：“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原书校注）

¹⁴ 列宁：《国家与革命》89页。（见中文版《列宁选集》3卷上册246页，人民出版社1972）

难回答共产主义的责难。列宁有句格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这句格言只有通过证实才能作为答案。无产阶级社会一部分人对这个论点作了最有意义的认可，他们希望用民主手段达到使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目的。不管这些希望合理与否，对我们目前的考虑来说，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希望也是从受惠较多而较少失望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的。在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纯粹是压迫的工具，要解救工人就需要消灭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潘恩的信念没有什么不同：“社会是我们需要的产物，政府则是我们弱点的产物。”

这种对民主国家讥讽式的评价与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评价相似。真正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爱国主义的忠诚。他处于给予民族凝聚力的整个忠诚和感情系统之外。这儿再说一次，共产主义的理论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仅仅学究式反民族主义的理论，它符合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经验，即符合真正被剥夺的工人的经验。他们被榨取的不但有物质上的而且有精神上的利益，而国家仅仅将这些利益赐予那些受惠较多的公民。爱国主义的热情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假若工人遭受的非正义不是忍无可忍，假若民族文化遗产哪怕最小部分能够留给工人，那么工人还是会响应国家求助的，虽然要比中产阶级更为勉强些。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议会社会主义政党在这点上的态度是有教益的。战前他们一律反对军国主义，坚持和平主义，他们反对增加军事预算，因为这种预算使战争不可避免，但他们最终还是堕入了战争深渊。列宁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的批评家对他们的变节行为嗤之以鼻，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领导者有野心和不诚实，但这种对既成事实所作的道德上的解释不仅与批评家的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不相容，而且对基本因素的分析也不够充分。只要一个国家没有完全剥夺工人的权利，就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效忠。与中产阶级相比工人的效忠表现得有点迟疑不决，

但总的说来，将其作为军事计划的现实动因而加以考虑时，它比国家应得的效忠更为慷慨无私。只有在非常睿智的知识分子那里才会不重视国家要求，工人中只有那些备尝国家贪婪残忍滋味的人，才会不考虑国家的要求。在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不妥协地反对爱国主义，在俄国无产阶级心中引起了共鸣。因为在俄国，工人完全地明明白白地遭受了剥夺；国家机器是如此明显的无能腐败，以致它不能要求得到觉悟工人对政府并使政府得以维持其功能的通常的那种尊敬。另一方面，在欧洲，工人的爱国热情虽遭压抑但未被摧毁，即使在德国君主制度由于战败而衰落之时，德国工人还是对反君主主义和反爱国主义加以区别的。每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工人犯了叛国罪。德国民族主义者仍然装着相信他们能赢得战争，并对社会主义者暗中中伤。就社会主义者而言，攻击他们叛国所必须其备的事实根据不足。现代工人遭受了多大程度的社会不公正，他们就会在多大程度上丧失其爱国主义热情。仅当他们被明显地排斥在文化遗产制度和经济利益之外时，他们才会否定国家。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在一场未来的战争中，全体工人要比过去更为成熟老练。人们不需要有亲身遭受彻底被剥夺的教训，社会的智慧就可以促使他们觉醒。工人中反民族主义的程度总是要取决于工人遭受社会不公正的程度。

把对阶级的忠诚夸大为最高形式的利他主义，自然会导致对国家忠诚的毁灭。一般而言，无产阶级的工人，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把对阶级的忠诚看作是第一位的要求。他是否将对阶级的忠诚看作是唯一的或者是第一位的，他是否认识到该阶级绝对能够用强有力的手段简化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都要取决于该阶级被社会所抛弃的程度。我们先前指出各个民族只有置身于其他民族之中，特别是置身于生动活泼的论战过程中，才能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一个阶级也以同样的方式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它越是感到它在与其他阶级进行斗争，它取

得的自我意识也就越明显。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将倾向于蔑视在一个国家结构里与其他阶级拥有的任何共同的利益，倾向于用比事实根据更为绝对的方式来解释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方法使得民族斗争或民族内部斗争的激情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热烈地但并不诚实地努力通过不断强调各阶级共同拥有的最小利益来模糊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无产阶级对各阶级间的共同利益的蔑视也正是对特权阶级的这种宣传努力的自然的有讽刺意味的反应。对于那些正像约翰·密尔所描写的“假道学”来说，这种讽刺性反应与那种将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共同利益作了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描述相比，至少是一样接近真理。密尔宣称：“商业应繁荣，劳动和资本所赚回的利润应丰厚，这既符合劳工的利益又符合雇主的利益。但就分配而言，说雇主与劳工有共同利益，就如同说对一个人的个人利益而言，一笔钱属于他自己和属于别人是一回事，都一样的不可思议。”作为最富于忠诚心的阶级，无产阶级通过赋予本阶级的普遍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来证明自己要求提高本阶级地位是必然合理的。在企图使其特殊价值普遍化方面，无产阶级与特权阶级并无二致，这乃是无产阶级对内在的理性和人类精神的道德需要所作的贡献。就无产者而言，其阶级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阶级，历史注定它还是一个负有实现无阶级社会使命的阶级。卡尔·马克思声称：“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¹⁵ 确切地说，马克思的这一学说中确有某些深刻的东西，

¹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66~467页，人民出版社）

这些深刻的东西要胜过学说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对无产阶级命运作戏剧性的宗教解释。人们必然会发现，马克思的真正重要性与其说是在其经济学中还不如说是在像这样的见识之中。他关于劳动价值的经济理论，也许是不可信的，但这种对价值作重新估价的企图，乃是一种高尚的态度。为了使受屈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最终得到提高，为了使他在社会失败的灾难中看到胜利的曙光，为了使他在丧失一切财产中看到将来任何人都无财产特权的文明社会，不得不采取这种真正戏剧性的和古典宗教的方式，以期反败为胜。尼采能把基督教的兴起看作是奴隶的反抗，他能在基督教柔顺宽容的道德学说中看到复仇的情绪。这种复仇是弱者将深刻的道德理想施加于强者，这种道德理想使弱者的德性神圣化，同时使强者传统的德性失去道德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类型奴隶的反抗，它提高的不是卑贱者的德性而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些现代的赫洛特¹⁶ 也对价值进行重新估价，这种估价所提供给弱者的是叫他们不要再卑躬屈节，而是向他们许诺有希望赢得天下。如果说信仰基督教的穷人希望信仰的力量最终会使温顺变得刚强有力，那么这些现代的穷人则相信历史唯物论的力量必将自动剥夺强者，损强补弱。

整个悲剧和整个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就存在于这些希望的差异之中。就其表示现代人在道德力量方面失去信心而言，这是悲剧性的差异；就其认识到作为人类共同历史基础的权力之间的斗争是残忍的而言，这无疑是有利的。如果说反道德主义和彻底决定论过分无节制的话，人们将会认为它们是技术文明的反道德的机械主义所产生的弊病。但它们也一定被视为掩饰现代社会残忍伪善的需要的解毒剂而大受青睐。而由本能所驱动的工业机械主义蔑视理性和良心的清规戒律，把那些深罹残酷之害的人变成决定论者。一种试图以不改变事实而用道德为托辞掩盖其残

¹⁶ 赫洛特：古希腊斯巴达人的奴隶。——原书译注

酷的文化，造就了那些了解事实的犬儒主义的门徒。只有历史才能决定作为既是这种文明的信仰受难者又是这种文明的道德拯救者的无产阶级，究竟是受难者的成分多还是拯救者的成分多。因为所有历史都是人性和非人性的命运之间的冲突，而且谁也不能肯定，在某一既定时刻，二者之间谁起的作用更大。任何历史哲学都免不了要依彻底胜利一方的观点夸张地显示未来。在真正的基督教徒的末世学中，德行最终依靠自己或依靠上帝恩赐的力量获胜。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末世学中，正义必将得到伸张，因为弱者必将通过以人类历史之无情逻辑起作用的经济力量变得强大起来。马克思主义者想象他们掌握了哲学甚至是历史科学，而他们所确实掌握的却是天启的幻想，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预言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政治希望越过理性可以证明的界限，达到了与宗教的调和，正如在真正基督教徒的灵魂里，道德的希望获得了宗教的证明一样。指望逆来顺受者或弱者去承继天下，即指望被剥夺者依靠自身道德品性或凭借他们真正被剥夺而产生的德性去征服世界，是件既“高尚”又“荒谬”的事。但两种指望都有真理的成分，因为历史有从道德上和政治上把强权者赶下宝座的趋势。由于强权者在政治上的失败比其在道德上的失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更可证实，并且可能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故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政治之梦想有现实意义，而这正是基督教徒宗教~伦理之梦想所缺乏的。他们二者都有宗教的成分，因为二者都希望将上帝现实化。但是由于政治理想比纯粹的道德理想更容易在历史上实现，故马克思主义者的梦想以其较少的宗教性更切合历史。在古典宗教里，纯粹理想在历史上的实现确实为人们所憧憬，但也确实是由于它太纯粹了，以致没有完全实现它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其中超越历史的因素归根到底占据着优势。

道德家们不难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赞扬声中发现非道德的因素，它受到既具有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又具有复仇心的指责。自我中心

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它是对当前受到挫折的自我的一种补偿。其人类意义和重要性在当前环境中已被破坏了的阶级，宣称自己是未来历史之最重要的阶级。当这一说明达到荒诞神秘的地步时，就会导致将阶级神化。它在主观上是想对当前社会下层作可以理解的反应；若客观地加以考虑，它可能是用来证明无产阶级在重建社会的任务中具有战略的重要性。谁能比那些最受文明局限性之苦的人更好地理解一种文明真正的特点呢？谁能比那些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破产现实的人更好地用绝对化的口气来表述社会理想呢？谁能比那些生活于由饥寒交迫、复仇和神圣之梦组成的狂飙式的热情中的人，在摧毁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更有创造活力呢？

当然，复仇的活动由于是激烈的和生死攸关的，所以，也是危险的，它可能产生非常大的破坏社会的后果。现代俄国人迫害敌对阶级的残余分子，将他们视为世袭的仇敌，采取无情的报复。他们用想象出来的荡涤过去的必要性来论证这种报复为正当，这样不仅以其残忍伤害了良心，而且往往妨碍了新社会秩序的建立。最近斯大林不得不命令停止对那些被怀疑为心理上属于旧社会的专家们实行暴力和恐怖政策。经验教育了他，使他懂得对新制度反对者的“清洗”政策应有限度。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阶级还是民族，都不可能靠消灭除它本身之外的一切来建构一个社会，因而最终不得不向错综复杂的社会让步，并希望赢得反对者的合作，而不是消灭他们或者相信凭借暴力可迫使他们归顺——而这种归顺是靠不住的。

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谴责拔高阶级的地位是不道德的，也仅仅是因为这样做是与民族忠诚相冲突，但他们并未提出什么重大的道德问题。他们的谴责建立在偏见和传统情感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因为与起作用的群体相比，不存在任何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同样也不存在任何比那些梦想一个理想联邦的阶级要求更好的民族要求，因

为它们体现着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当然，无产阶级要求的合理合法性并不能保证完全战胜它对之有所求的国家，无论在哪儿，国家总不会全部地剥夺本国的无产者，无产者倾向于用对国家的忠诚作为标准来为他们对阶级的忠诚辩解，将其使命解释为要使一种民族的复兴。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民族内部的而不是立足于民族之外的一个救世群体，他们号召所有那些理解民族群体所处危险境况者，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都来和他们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特别是在英国的社会主义内部，这已成为一种趋势。¹⁷ 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是否为民族感情牺牲得太多了和过早了，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工人们的道德犬儒主义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文化和政治中所有的道德主张的轻视，对道德上的劝谕手段拒绝承认，甚至作为创立新社会合适措施的政治压力，也被其不妥协的社会伦理理想荒谬地解除了。无产阶级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无产阶级的胜利是要将社会引导至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无产阶级的平等主义太绝对了，以致不能满足复杂社会和人性弱点的需要，那么，它至少有这样的优点，即向人类思想史上司空见惯的一切貌似合理实则不平等的现象提供了有益而必要的解毒剂，并设计了终究要作为合理的社会理想的社会目标。霍布豪斯 (L. T. Hobhouse) 宣称：“以正义为基础的平等意思是说每个人和每个能够协调的机构必须平等地考虑如何建构协调计划……由此可见除非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否则一个人直至所有的人都可以要求受益，而整个起协调作用系统的某些必要条件仍是差别的唯一的最后的根据。”¹⁸ 用如此可接受的理性语言来表述平等的原则可能会承认一些坚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承认的职务上的不平等，但它一定会拒绝承认目前经济制度

¹⁷ 尤其要参见麦克唐纳 (J. Ramsay MacDonald)：《议会和革命》。

¹⁸ 霍布豪斯：《社会正义的成分》172页，并参阅 R. H. Tawney：《平等》。

允许的大多数的不平等。如果用来陈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言辞过分激烈,那可能完全是由于生机勃勃的伦理理想主义总要产生出来的宗教的联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确实是理想的,尽管这种理想象基督教宣扬的博爱理想那样,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得到彻底实现,但它是理性社会前进的目标。宗教的联想则可被认为是使这种理想不致被削弱的保证。社会的重建是否能将人性改造到足以使理想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回答,而绝不是如马克思主义热心家那样信心十足确定无疑地用严格推理能够回答的。

平等主义的理想不是来自纯粹的伦理想象,而是起因于无产阶级特殊的生活环境,这一事实无损于将平等理想作为最终社会理想的合理性。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曾深受不平等之苦呢,还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控制的范围之内正具有施加于他们的平等呢?这还是个问题。两种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形成理想的成分。社会理想有时会成为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的反面,亨利克·易卜生观察到最酷爱自由的人乃是受沙皇独裁统治之苦最深的俄罗斯人。因此受不平等之苦最深的无产阶级很自然地要通过反抗来达到他们的平等主义的目的。正如德曼(Deman)所说,忌妒因素亦可成为他们的动机之一。¹⁹而且,对工人阶级实施生活条件的平等以及使工人获得几乎相同的生活水平,能促使他们将此种类型的善推广于整个社会(从而不自觉地希望整个社会受其缺点之害)。不论组成无产阶级理想主义的混合动机是什么,它的社会合理性依然是不受这些观点干扰的。同时,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对正义社会的渴望,是工人阶级社会观中重要的成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每一时代的被剥夺者都梦想有一个公正的社会。现代无产阶级把自己同其他时代的非特权阶级区别开来,仅仅在于无产阶级的想象力

¹⁹ 见亨利·德曼:《社会主义心理学》。

的宗教性不太明显而政治倾向性却很明确。

必须肯定这种梦想的伦理性质，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深深陷入道德犬儒主义时，就更愿对此加以肯定。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中，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否认社会主义目标的伦理性质上态度最为明朗，他声称：“怜悯穷人，热爱平等自由，承认社会不公正并要求消除之，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谴责富豪，尊重穷人，如同我们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里发现的一样，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儿，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敌手。如果没有这些前提，现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存在。”这种用纯粹非道德的语言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努力，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特征，尽管是一个次要的特征。这个特征，被正义社会之许诺所否定了；这是无产阶级所作出的一种许诺，并且强烈地以笃信宗教的感情信仰它。对未来无阶级社会的想象，给其阶级胜利的美梦抹上了道德的尊严。凭此想象，无产阶级避免了片面性和相对性，而使自己的努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假如在估价这个阶级在拯救世界的贡献中有宗教幻想的成分的话，那么多半也是由于过分强调了这些成分的作用而产生的错误。除无产阶级的救世的精神力量之外，社会上还有其他的拯救力量。社会上总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能清楚看到那些不同于无产阶级用其苦难加以表现的东西。社会上也总有这样一些意志坚强的人，他们与因自己个人痛苦经历而坚强起来的人有所不同。这些人因受人类想象力之局限而数目有限，由于这种限制的存在，所以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那些在他们亲身经历之外的事物。无产阶级的普遍化要求中的幻想成分与国家与特权阶级类似的要求相比，无疑不会大于后者，或许比后者少得多，有意识的不老实和欺诈就更微乎其微了——因为无产阶级并不想为自己谋私利，也不愿和其他人分享这种私利。如果无产阶级没有特殊利益要维护而应具备这种诚实的美德，那么就应牢记这个不

受诱惑的美德。因此，其道德的性质也不会丧失，虽然它可能并不像已经克服了诱惑的美德那样纯正。耶稣为穷人的祝福及耶稣对富人的警告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认识到富豪对人的诱惑太大了，以致人们难以克服这种诱惑。他们只能以自愿贫困或非自愿贫困的方式来逃脱这种诱惑。特权使一切人变得不诚实，最纯洁的良心和最纯洁的心灵都极力证明它们在道德上是合理的欲望，结果反被玷污了。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中产阶级不愿承认无产阶级愿望的真正的道德价值更能清楚证明中产阶级的偏见了。事实上，由于它专注于小善和大恶，所以它没有远见卓识，不能真正重视富于反叛精神的工人的道德学说。然而公正的观察家不得不承认拉斯基所说的：“共产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是靠理想主义而不是靠现实主义，是靠信仰上的许诺，而不是靠唯物主义的高瞻远瞩。”²⁰

真正的理想主义始终是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的，它是如此之彻底，以致一旦完全忽视社会生活中道德的理性因素，它就处于危险之中。也曾有过其他的正义、平等之梦想。马克思主义者之梦想的显著特点是把推翻政权看作是实现梦想的先决条件，平等将只能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建立，即通过消灭财产私有制来建立；而无论什么地方，私有财产就是社会权力。假若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过分倾向于犬儒主义，低估社会理性在消灭权力并且使之处于控制之下的能力，那么他就不是犬儒学派之门徒，而是一个主张社会权力分配不均是社会不公正真正根源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已经看到特权是如何必然地与权力相关，同时看到，现代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多么重要的权力。清楚地认识这个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社会生活问题所作出的最伟大的伦理学贡献。它有时可能没有明显看出，一个复杂的社会总会将政治的或经济的权力集中到危险的程度。只有那些清醒而强有力的国家，才能通过以政治权力取代经

²⁰ 拉斯基 (Harold Laski)：《共产主义》250 页。

济权力来防止经济权力集中化。政治权力取代经济权力的主要好处乃是使特权只是政治权力一种可能伴随物，而不是一种必然伴随物，也不会像经济权力那样容易通过继承来传递。希望通过粉碎经济特权以达到不再有人想以权谋私而改变人性，这种希望大概只能归于流漫主义的空想，以后我们将会更多地论及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依然存在着权力这东西，那么人类就绝不能避免赋予当权者最大限度的伦理的自我控制力的必然性，但这并不能排除将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必然性，不能排除使其余人处于最强的社会控制措施之下的必然性，以及摧毁根本不服从社会控制的权力形式的必然性。因为如果权力是没有节制的，就没有足够强的伦理力量来从内心遏制对它的使用。麦迪逊宣称：“不应信任所有的当权者，这是一条真理。”²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国历史都证实了这个结论的真实性。正是因为道德家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结论的真实性，所以他们才连续不断地犯错误。他们梦想正义，但又没有一种能够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从而确立正义的政治纲领。

只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完全清楚地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选择达到其目的的手段时犯了错误，那么，它无论是在表述社会必将朝之前进的平等正义理性的目标时，还是在理解正义的经济基础时，都没有犯错误。假若在选择手段时，它的犬儒主义常常是它毁灭的祸根，那么它以政治经济的方法实施伦理理想的现实主义则是其社会重要性的根据。

无产阶级不仅在其社会目标的设计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坚持实现目标的迫切性上也是正确的。有闲阶级可能继续梦想社会的自动进步，他们未充分遭受社会非正义之苦也就没有认识到不公正对社会生活之危害。唯有无产阶级看到了现代社会权力和特权的集中化进展得如此之迅

²¹ 《杰姆·麦迪逊论文集》，H. D. Gilpin 编辑，2 卷 1073 页。

速，以致它不但伤害了良知，也摧毁了社会基础本身。它还看到了每个国家内部之不平等是如何迫使国家不得不尽可能地使国与国之间关系变得相互隔阂，同时它们却要求提供给它们的市场，以便产品获利，但又不让群众有消费这些产品的能力。²² 它看到了这种国际行为相互隔阂如何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最终甚至没有为其直接目的服务，终于造成了国际萧条，各国发现自己存货过剩而不平等的分配又为广大群众的消费造成障碍。无产阶级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看得比其他阶级更清楚，乃因为它处于失业者的行列之中。假若他受雇佣，他就知道剩余劳动如何使他的劳动变得廉价，如何比以前更危及他的生活水平。其他人也可能看到这些事实，但没有一个人能像那些在自己一生中亲身感受其后果者看得那么清楚。正是无产阶级预言了现代社会的灾难（或许实际上成为大变乱的晴雨表），正是无产阶级成为拯救社会最强大的潜在力量，不管它是希望拯救社会免于灾难，还是它已完全成为大变动的力量并希望只有在灾难后才能从事拯救，都将取决于其受难程度之大小。因此我们不必将它的历史预言或政治战略看作是权威性的，虽然它要求它们应成

²² 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弱点。他的用语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困难诊断的全部内容。德国经济学家鲍恩（M. J. Bonn）写道：“我们所生活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养成了转嫁信贷之习惯。这种习惯的灵活性极大，主要表现在产品流通中。它仍然被前资本主义观念‘消费是一种罪恶’所困扰，认为它多少表现出不能消除的奢侈；且不说消费者的资金毕竟在整个消费中只占较小部分，事实依然是生产借助于存款和信贷一再扩大，尤其借助于那些费用大的工厂的建设和扩大，这些工厂能生产出如预算宣布那样便宜的产品。工厂总是充分得到利用，而消费情况如何则置若罔闻……这样就产生了以技术支配生产的观点，使它在时间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消费，这是因为技术上的完善可以保证生产，但金融却未取得成功。”（鲍恩：《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141~142页）

这段分析的唯一错误在于，假定生产资本和消费资本不成比率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的习惯而不是不平等经济权力的社会各种权力谋取私利的盲目性所致。

为绝对真理，但它们如同一切信念那样，是受特殊环境条件制约的。如果有闲之辈感到太满足了，那么它也许会觉得这样太失望了，以致使它看不到一切有关的事实。因为它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完全地站在现代文明之外，它的视野相对来说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好。但也由于它是局外人，它可能看不到社会内部一些理性和拯救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一定要考虑在内的。如果我们承认它的社会观点是合法的社会目标，那么我们还应该用批判的态度细细评判其为达此目标而采用的手段。社会需要更大的平等，这不但是因为社会要发展而且是因为社会要生存；不平等的基础就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均。在认识平等正义的目标和分析现今不公正的根源方面，无产阶级确有真知灼见。但无产阶级想用的手段是否如它想象的那样是唯一可能的手段？或者这些手段是否是为一个理智的现实社会所设计的最灵验的手段？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它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以及一种绝对权威的历史哲学与一种同样绝对和正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必然存在于宗教的超信仰的范畴内，而不是存在于科学真理范畴内。无产阶级对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及暴力的功效充满信心，这信心中可能有真理之成分，但信心中的真理或许不像无产阶级想象的那样令人信服或绝对无疑，因而必须加以仔细分析。这种分析必然包含其他可供选择的观点。社会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清除掉社会非正义，而这种方法提供了某些公平的机会，清除今日社会之罪孽却不毁坏内中保存的有价值的东西，不冒险以新的弊端和新的非正义代替被抛弃的弊端和非正义。这个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两个不愿考虑的有争议问题。以无产阶级的观点看，现代社会没有任何值得保存的善。它心目中也并不为未来担忧，像所有绝望的人一样，无产阶级称得上是对未来的空想主义者。